

(1978 ~ 2008)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A Chronicle of Ev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978 ~ 200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978 ~ 2008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编.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95 - 1018 - 6

I. 中… II. 中… III. 改革开放 - 大事记 - 中国 - 1978 ~ 2008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826 号

责任编辑: 张立宪

责任校对: 黄亚青

封面设计: 郁佳

版式设计: 董生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 @ cfeph. 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41.75 印张 1 008 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86.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018 - 6 / F · 084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前 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迄今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的时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却是一次扭转乾坤、翻天覆地的巨变。正是在这30年间，中国社会开始回归常识，回归历史，回归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

为了忠实、客观、准确地记录这段历史，为广大读者提供基础性资料，我们编辑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

本书的特点是：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采用编年史体例，按年分章，依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辑。凡属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方针、政策、措施、事件和主要成效，都辑录在内。同日内发生的不同事件，只标出第一事件的日期，其余用△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文件，以文件签发时间为准；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发布时间为准。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尽可能做到简明扼要，同时又保证具有丰富的信息量。因此，我们对所涉及的历史文献和重大事件都作了精心的概括与提炼，以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引用。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在时间上，除了辑录了1978~2008年的资料，还增加了1977年的资料，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历史背景。在内容上，特别收录了党中央、国务院各种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以使读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

我们诚挚地希望，这里奉献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将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简史，是一部辑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文献总汇，是一部广大研究者和热心读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

2008年5月

目 录

1977	(1)
1978	(8)
1979	(16)
1980	(29)
1981	(46)
1982	(61)
1983	(80)
1984	(99)
1985	(116)
1986	(135)
1987	(153)
1988	(173)
1989	(200)
1990	(230)
1991	(259)
1992	(290)
1993	(321)
1994	(376)
1995	(399)
1996	(419)
1997	(439)
1998	(459)
1999	(479)
2000	(496)

2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978 ~ 2008)

2001	(512)
2002	(529)
2003	(547)
2004	(567)
2005	(594)
2006	(614)
2007	(631)
2008	(653)

1977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指出，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是我们全年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把“四人帮”揭深批透，把思想政治路线搞清楚，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够搞得更好。

1月8日 新华社讯，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连日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国防科委，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在京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港澳同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全市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街道等基层单位，普遍举行了纪念会、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

2月7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还指出，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使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

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文章“抓纲治国”指出：抓纲才能治国。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正确处理纲和目、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是政治觉悟问题，也是领导艺术问题。我们要把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摆在议事日程的首位。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深入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2月15日 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余秋里主持下，国家计委同各地区、各部门从1976年11月开始，着手制定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

2月25日 在于光远的主持下，召开北京地区的学术讨论会。经过酝酿，确定首先从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方面的谬论开始，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在这个会上，于光远说明召开这样的经济理论讨论会的意义，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用它来说明“四人帮”讲的那些“理论”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此后，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全国性的综合性学术讨论会，一共开了4次。

2月 邓小平同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

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基本同意国家计委的汇报。

3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3月3~16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

3月10~22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部署1977年的工作。会议对《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部分反映强烈，发言踊跃，对1977年计划表示同意。会议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适当时间，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要在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他还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3月14日 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胡耀邦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下达1977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经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同意《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并批准1977年计划。

4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一文。

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信件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4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全国发行。第5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许多著作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4月20日~5月13日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北京召开，7000人参加会议。5月9日，华国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工业学大庆的重要意义，要求3年内把全国1/3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到本世纪末石油部门要为创造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

5月1日 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文中引用了毛主席1956年所说的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除球籍

的话。其实，在1963年时，毛主席已经认为本世纪末赶不上美国，改为走在世界的前列。华国锋的文章重提超过美国，就把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5月中旬 胡耀邦主持召开讨论教学问题的会议。他问：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我是想进的。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任务是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刊物，不要长篇大论，不当重武器用，只当手榴弹用，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掀起点波澜就可以。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是文献性质的。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是向学员作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5月24日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话中提到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的事情。邓小平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7月16~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会上，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今后8年，除抓紧把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简称“四三方案”）中的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

8月3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在谈到《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时邓小平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在谈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问题时说：班子不能散，这个班子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义再说，反正理论队伍不是多而是少了。

8月4~8日 邓小平召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共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他指出：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8月1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

活开始有所改善。这次调整的范围是：1971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 1 级工，1966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 2 级工，以及同他们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企业干部和商业、文教卫生、国家机关等部门的职工。除上述两类人员以外，对 1971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也调整一部分，调整工资的人数，不超过这部分职工人数的 40%。通过这次调整，60% 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

8 月 12 ~ 18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他指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表示，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叶剑英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8 月 13 日 ~ 9 月 25 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召开的。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规定 1977 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 30 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8 月 19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8 月 24 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

9 月 5 日 邓小平同方毅等商谈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问题，并要求中国科学院起草一个书面报告，提出国家科委的领导人选，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6 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我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来恢复国家科委势在必行。”“原拟在国务院设科教组的方案，拟取消。”“大学科研由科学院统一规划。”“国防科研由国家科委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统一规划。”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9 月 6 日 邓小平会见基恩·富勒为团长的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他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

9 月 9 日 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9 月 10 日 邓小平会见以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他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

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

9月11日 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他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9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28年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科学技术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确定科学研究机构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认为应该恢复研究人员和教师的职称评定。

9月19日 邓小平和方毅同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9月29日 邓小平和邓颖超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我们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邓小平会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他指出：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但要谦虚一点，合情合理一点，合乎实际一点。

10月7日 根据胡耀邦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党校杨绛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揭露了“四人帮”对干部进行诬陷迫害、残酷打击的种种事实，尤其是迫害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的罪行。文章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发表后，广大干部群众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约一万封信，热烈拥护文章的观点。

10月12日 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0月18日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提出，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10月21日 邓小平会见法新社社长兼总经理克洛德·鲁赛尔及法新社香港分社社长

德·戴维斯。在谈话中他指出：我们的工资，在1974年、1975年先后两次提出要调整，但都没有调整，这都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差不多10年以上没有调整工资了。这次调整面比较大，重点是让大量低工资的人收入有所增加。以后可以每隔一两年调一次。

10月23日 邓小平会见查尔斯·约斯特为团长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在谈话中他指出：过去“四人帮”指责我们搞现代化，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就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我们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邓小平又指出：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林彪、“四人帮”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

10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煤炭部汇报。汇报提出，煤炭工业今后23年要有个大发展，关键是近10年，首先是“五五”后3年。1978年、1979年每年增产4000万吨，1980年及“六五”期间每年增产5000万吨，1986~1987年每年增产6000万吨，1987年总产量突破10亿吨，本世纪末最后13年实现更大跃进，每年增产7000万吨，2000年向20亿吨进军。

10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7年42号文件指出：中共中央8号文件通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现在，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编委会副主任。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编委会委员。

11月1日 邓小平听取洪学智、叶正大、郑汉涛的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要建立岗位责任制，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物质奖励还是要的，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搞计时工资，也搞计件工资。工厂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研究所里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要恢复各种制度，恢复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要从工作需要出发，要很好研究，哪一些是需要的，赶快恢复起来。没有岗位就没有责任。

11月3日 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他在谈话中指出：发展科学的方针，我们已经定了，即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们赶超的起点。但我们还要有具体的方法，要采取具体措施，不能光说空话。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邓小平又指出：按劳分配问题过去解决不了。现在看来还得按劳分配，必要的物质鼓励还是得要。今后全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

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冶金部汇报。冶金部提出，“五五”后3年，要依靠现有基础，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地实现全面大跃进，1980年计划产钢3500万吨，力争达到3800万吨。在此基础上，1985年产钢6000万吨，力争达到7000万吨；1990年登上1亿吨钢的高峰；在本世纪末拿下二十几个鞍钢。

11月17日 邓小平和苏振华、罗瑞卿等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汇报。他在谈到外汇问题时说：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他说，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用这些外汇进口大中型设备有什么不

好？在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11月18日、23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要点的主要内容是：23年设想，“五五”后3年安排，“六五”计划轮廓，10个重大政策措施。《汇报要点》提出：“要打好关键8年这一仗，实现上述各项设想，需要采取一些重大的政策和措施。初步考虑，主要有以下10条：（1）整顿；（2）引进新技术；（3）科研和技术训练；（4）质量第一；（5）经济核算；（6）专业化协作；（7）劳动力安排；（8）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9）体制；（10）统一计划和责任制。”

11月24日~12月11日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30条），以及《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12月11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着重讲了1978年计划和经济体制问题。他指出：“体制还在变动中，不能定型。问题是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经济基础。”

11月28日 邓小平和李先念听取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商谈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问题。针对有人提议将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并一事，邓小平提出：国务院政研室还是单独保留下来好，负责人可以兼两个单位的职。名称就叫国务院研究室。还是你们这个班子。研究室的同志还可以和国务院各部委联系，搞调查研究。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

△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指出，为了确保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保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信贷管理、结算管理、现金管理、工资基金管理、金银外汇管理、金库条例、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基本制度的贯彻执行，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信贷、结算和现金活动的中心，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的单位，与财政部分设。

12月6日 邓小平和王震、罗瑞卿、张爱萍、洪学智听取第三、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人吕东、李成芳、张珍、柴树藩汇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有两个问题可能拖我们的后腿，一个是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问题；另一个是农业问题。要解决农业问题，就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机械工业要武装农业。农业机械要质量好、价格便宜，要有配件。发展工业、农业都要有具体措施，光讲空话不行，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

12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共中央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12月31日 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设，自1978年1月1日开始分开办公。

1978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继续抓紧抓好。社论还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在新的一年里全党要大抓农业，下决心把农业搞上去。各行各业都要关心农业、支援农业，为农业的发展开绿灯。农业的速度加快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速度才能加快。工业方面，要突出地抓电力、燃料和运输。这些“先行官”上去了，钢铁工业和其他原材料工业，也就上去了，就现有的工业基础，增长速度也能大大加快，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就能出现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1月7日 胡耀邦主持召开国家计委、一机部、农林部等部委政治部门负责人和“五七干校”待分配干部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解决仍然留在“五七干校”的干部的分配安置办法。他指出：要充分肯定国家计委的做法，希望各部门参照国家计委的办法，由主要领导同志出面，亲自召集一些待分配干部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些调查研究，制订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

1月2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1月28日、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订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该《纲要》1975年拟订过，经过当时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讨论，没有通过，即被“四人帮”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加以批判。这次修订，是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23年设想的《汇报要点》中“五五”后3年的安排和“六五”计划的轮廓进行修改的。

1月30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改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报告》，决定所有国营企业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50%留给企业，30%上缴中央财政，20%由地方掌握安排。

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文章介绍了中共安徽省委经过3个多月由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酝酿讨论，产生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省委六条”）。文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注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2月5日 中共中央将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

2月17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财政体制的通知》，增

收分成是指地方财政收入本年比上年实际增长的部分，按照核定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

2月18~23日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3月8日 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5日~3月5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报告提出，今后8年，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和1978年计划。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1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上海市、冶金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近期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4亿元，国内投资70亿元。

3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8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其中：第一批拟于1978年签约成交近60亿美元；第二批签约80亿美元，拟于1979年、1980年两年成交，其中26亿美元为第一批项目结转继续成交，54亿美元为新项目；第三批签约成交40亿美元，除了专用材料、单机及技术专利外，主要是第二批项目结转继续成交额。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

3月18~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

3月28日 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邓力群谈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问题。他指出：国务院政研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转《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

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继续进行。

4月14日 财政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问题的报告》。财政部建议,合理安排建设布局,整顿基本建设管理,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

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4月2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在全国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企业试行。

4月18日 薛暮桥致信邓小平、李先念。他在信中指出:今后8年投资4000亿元,确保120个重点建设项目和其他配套工程,补足短线以后,已经所余无几,各部、各地区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年年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同时鼓励中央工业、地方工业、社办工业都大干快上,这里是有矛盾需要研究解决的。他表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但要总结历史经验,又必然会触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冲破“禁区”。

4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5部委关于《今后8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的汇报。《规划要点》提出,到1985年累计外汇收入1050亿美元,其中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200亿美元(用国家贸易外汇支付150亿美元,利用银行外汇存款50亿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

4月22日~5月16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5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对按劳分配的攻击和诬蔑,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按劳分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文章明确提出,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

5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指出:要有条件、有计划地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各地区、各部门今年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单位,最多不要超过所属企业总数的30%。

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一条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赞同,也受到少数人的非议和责难。此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5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

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30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提出要着重讲实事求是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讲话稿中。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1日、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以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报告。赴日经济代表团的报告，总结了日本在战后经济起飞的三条主要经验，对今后10年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提出了五条建议。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报告，提出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同时，利用港澳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6月15日 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到“特约评论员”的名。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么！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6月22日 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他指出：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能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搞它几百个项目，从煤炭、有色、石油、电站、火车，一直到饲料加工厂，不要把宝贵时间耽误掉。

6月24日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正面回答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文章指出，持“凡是”立场，“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全文转载。

6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谷牧访问欧洲5国的情况汇报。汇报建议，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同美苏矛盾很大，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西欧目前经济萧条，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同西欧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正是有利时机。

7月6日~9月9日 国务院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60多人参加会议，围绕怎样加快现代化速度这一主题和华国锋出的四个题目（引进新技术、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计划平衡、出口贸易），先进行分组讨论，然后大会讨论。9月9日，李先念在务虚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过去20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尽可能适应工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他还提出，8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从原来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